

世界共產主義・沒落抑分化？_上

楊允瑛譯

原載 Modern Age 九卷三期

一 自獨一的全球性共產主義至多 核心主義

世界共產主義自有史以來，有兩件最顯著的重要事情。第一件事，是一九一七年秋季的布爾希維克革命。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急進份子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一個簇新的政府——蘇維埃國家，以使全世界變成共產主義的社會為其目標。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團結所有的共產主義者，與急進社會主義份子，在共產國際中去尋求同樣的目標，為此，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屆大會。

由於在期望中的歐洲革命未能實現，因而產生了發展世界共產主義的初步決定。因此，亦形成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漸漸地加強了對蘇俄依賴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尤其是又將共產國際會議的地址設在莫斯科。第三或共產國際，其基礎是建立在所有參加會議的共黨，均為一律平等的原則之上，但漸漸地，却演變成了，採取蘇俄共黨所用的方式，由中央來控制全球的黨。在這段時期中，藉各地革命以完成世界革命的希望已告幻滅，世界共產主義的命運，變成與蘇維埃國家的命運密接而不可分。

這種情況，不久便顯示出了，蘇維埃聯邦是一個世界上的強權，它具有兩種顯然不同形態的特色。革命國家的出現，不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而且亦是以「蘇維埃的愛國心」來作為激勵的蘇俄統治權的新化身。蘇

維埃共產黨，是蘇維埃政權的核心，而且，以兩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它是一個國家的黨，就這個字的廣義而言，它是一個國家的機關，同時，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在蘇維埃國家之上，黨行使着它的獨裁權，這種權力，不但確定了它在共產主義國家系統中的領導地位，而且，亦可利用這個力量，致力於現存國家的革命，以達到世界霸權的目的。在奧托曼帝國的早期，可以發現有局部的歷史與此相同，奧托曼帝國將土耳其薩爾丁（Türksal Sultanate）與伊斯蘭的克里菲特（Caliphate of Islam）相合併。由於有對整個社會產生激變的需要，加深了共產主義的傳播者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熱誠。

在史達林時期，共產國際在獨裁的控制下，逐漸壯大。列寧的繼承者認為，當蘇維埃聯邦，「世界革命的基礎」與「勞苦羣衆的祖國」，遭遇到任何外來的攻擊時，所有外國的共產主義者，均有保衛它的義務。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他對蘇維埃聯邦表現得十分忠誠，以作為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考驗。至於共產國際中的每一個團體，都必須服從莫斯科的命令，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共產國際中，權力已自選舉出的執行機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PI），轉移至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當史達林主義達到巔峯狀態的時候，已經集中化了的世界共黨，變得更为獨裁。對全世界應用了「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的原則，當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傳達命令的時候，則經由蘇俄共黨國外部分的傳達，而至共產國際的每一機關。當史達林在蘇維埃聯邦的內部衝突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後，這場衝突經過了一九二九與一九

三〇年的那段有決定性的時期，他亦變成了共產國際事實上的絕對統治者。戴爾加度（Castro Delgado），前任西班牙共黨代表，以下面的一段文章，來描寫一九四〇年以後數年間國際共黨執行委員會的情況：

史達林位居最首，為全權總司令，在中間階級的人，服從地位較高者的命令，而向地位較低的人發佈命令時，以像父親般但堅強的語氣，而小官在發佈命令時，則以刺耳的聲音咆哮着，像軍曹一樣。但只有一種方式去服從。違抗命令是不會被寬容的。

因為共產國際執行機關的大部份職權已被移轉至莫斯科總部，所以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在這個組織中，並未發生任何影響。全部機構仍繼續存在。李溫哈德（Leonhard）在他著名的「革命的孩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中，對組織的調整，曾作了某些詳細的描寫。

雖然史達林的決定解散共產國際，其動機乃基於純粹的戰術理由，但因此而使世界共產主義在其歷史上產生了一個新的局面。在「民族陣線」政策之下，對各個國家中的極權共黨，給予某種程度的自治，容許他們去追尋「至社會主義不同的道路」。對南斯拉夫的狄托與中共的毛澤東而言，這種發展，對他們十分有利，他們二人都支持獨立的民族共產主義力量，並想藉此以實行盧維沙爾（Ljovitchal）所謂的「共謀解放」。狄托的叛變，使史達林企圖利用共產主義情報局（Cominform），以加強蘇俄對歐洲共黨控制的目的失敗，當時，毛澤東在中國內戰中獲得勝利，在亞洲產生了一個新的共黨政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蘇俄變成了世界的強國，戰後共產主義國家組織的形成，在黨與國家的利益之間，不可避免的要發生摩擦，因此，使世界共產主義團結運動，受到了空前的危害。以「東方集團」形式來發展共產主義國家組織的，採用三個步驟：

（一）將「人民民主國家」的內部組織，變成蘇維埃的形式，其中包括在德國的蘇俄佔領區——這種程序，通常稱為「蘇維埃化」。

（二）擴張隱藏在合法形式及高度精密組織的國際條約中的霸權帝國的命令。

（三）將政軍、經濟、法律及文化，逐漸地接合為一體，這種程序，首先

世界共產主義：沒落抑分化？

在「東方集團」的東歐區中被採用過。

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歐洲的中東部分攫取到政權，乃係由於在該區域內，原有的政府制度全部崩潰之故，那些政府，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立即組成的。另外一方面，在東亞，共產主義的奪取政權，幾乎都與脫離殖民地的全部過程有密切關連。

至於許多「人民民主國家」中，具有統治權的共黨與蘇俄之間，史達林在開始時即迫使他們形成一種從屬的關係，就像在第三國際中所做的一樣。舊有的共產國際機構，被訓練成要絕對的服從克里姆林宮內的中央當局，如此，奠定了史達林的威信，他的命令，必需貫徹實行。像波蘭的貝盧特（Bierut），捷克斯拉夫的哥特瓦爾德（Gottwald），匈牙利的拉柯西（Rakosi），保加利亞的狄米特洛夫與契爾文可夫（Tschervenkov）等人，必服從莫斯科的命令，乃預料中的事情，雖然狄米特洛夫有時會採取他自己所擬訂的特殊政策。對狄托，史達林做了一件錯事，證明了狄托既不服從，亦不可能以莫斯科所鼓勵的宮廷革命方式將其除去。

史達林對歐洲中東部共產黨控制的程度，以一九四七年夏季表現得最為令人難忘，那時，史達林迫使捷克斯拉夫的哥特瓦爾德政府——該時，「民族陣線」與一個非共黨的多數黨共存，尚未組成「人民民主」——放棄派遣代表團至巴黎出席第一屆馬歇爾計劃會議的企圖。在莫斯科，那一段紀律嚴格時期的情況，在德節德爾（Dejter）所寫的著名的狄托傳中，曾敘述過。當狄米特洛夫與狄托動議計劃組織巴爾幹同盟時，史達林立即召喚該兩國的代表團至莫斯科，措詞嚴厲的向他們訓話。他指責南斯拉夫陷入了永不與蘇俄共商對外政策的壞習慣中。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他通知南斯拉夫的代表團，在對外政策問題與蘇俄聯合磋商的協訂上，代表他們本國政府簽字。第二天，卡爾迪爾捷（Edvard Kardelj），今日乃為南斯拉夫狄托的要人，被莫洛托夫（Molotov）召見。當抵達蘇俄外交部部長辦公室時，他發現條約簽字應有的一切準備均已準備妥當，但在這之前，他却不知道該條約的內容。因此，卡爾迪爾捷並沒有機會向其本國政府請示。他後來會寫道：「我看到藍色的紙夾中有兩張紙。我聽見莫洛托夫以刺耳的聲音命令道『簽字！』於是我憤怒極了」。但卡爾迪爾捷終於在上面簽了字。

自從這個事件之後，共產國際機構中的舊派衛護者，多被處死或以「反

史達林化」為藉口而被清除。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t)是東方集團中唯一的例外。在其他區域中，尚有一小部份舊派的殘餘份子，其中包括在南美的共產主義領袖們，如阿根廷的柯多維拉(Codoville)，巴西的普里斯特斯(Prestes)，與哥倫比亞的維亦拉(Veiza)等人。古巴的布拉斯陸卡(Bias Roca)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即為該國共產黨中最高級的官員之一。事實上，這些舊派共產國際的官員們，現在仍在拉丁美洲活動，儘力阻止卡斯基以武力去排斥這個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其他的領導人物亦認為，他們曾在共產國際的機構中服務甚久，因此，亦應給予他們一種平等的地位。

如果再作進一步的觀察，史達林主義體系的莫斯科控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東方集團中的發展，我們可看出與中央集權的共產國際組織有許多共同相似之處，關於這點，戴里加度(Delgado)曾敘述過。從瓦拉戴斯德·戈慕卡(Wladyslaw Gomułka)——一九五六年十月革命後，波蘭的共黨頭子——在下面的記載中，可得到證明。他曾作過這樣的陳述：

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之中，只有史達林，他站在被人尊敬的特權階級的頂端。所有在他下面的人，都要向他低頭。這批尊敬史達林的人們，不但包括蘇聯共黨中的其他領袖們，以及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們，亦包括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許多國家的共產主義及勞工黨派的首領們……這個被崇拜的偶像，是無所不知的，明確的知道每一件事的作法，解決所有的困難，同時，在他活動範圍之內的一切事情，他都能作明確的指導與決定。

黨並不是促使東方集團團結的唯一束縛，關於這點，已在史達林主義元首制度下表現得十分明顯。此外，尚有秘密警察，全能的蘇維埃軍隊，與衛星國家對蘇俄經濟上的依賴，以及統治官員們所形成的新階級中應負的連帶責任。世界共產運動，被蘇俄情報及國家警察機構嚴厲的控制着，同時，外國共產黨在財政方面亦需依賴蘇俄的支持。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之後，他的繼承者，致力於達到某種程度的以合作來代替強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對改良的共產主義者，對「至社會主義不同的道路」理論所作的解釋，給予有限度的承認，而且將他們控制的方式，加以修改。認為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應用，須採取一種更為變通的方式。這對共產黨及構成東方集團的國家均有利害關係。蘇聯於最初，似乎不願放棄共產主義情報局，該局於一九四七年成立，為蘇聯

變更政策時的傳遞工具。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黨大會之後，發生了一項重大的轉變，那就是在那次會議中，發出了反史達林化的第一個訊號。共產主義情報局被解散，以及與狄托的調停成功，可看出是將重點放在黨與黨間的雙方關係上。集團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自一九五四——五年將經濟互助會議(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通常稱為 COMECON——改組之後，開始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華沙公約組織的確立，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東方的一個相對立的力量。多邊條約的增多，彌補了以前所採取的雙邊條約政策的不足。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蘇聯政府的政策報告——於紅軍干涉匈牙利前即時所發佈的——維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但亦表示出希望將東方集團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建立在「和平共存的五點原則」之上，尤其注重權利平等的原則。波蘭的十月革命，與一九五六年十月及十一月匈牙利的民間起義，使蘇維埃領導者再次加強了實行帝國霸權中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為了應付東方集團中的民族對解放的渴望，蘇聯政府在兩個不同的範疇中採取了行動。在政府與政府關係之間的範疇之內，是利用締結許多雙邊及多邊的防衛、經濟、情報、文化、科學、福利與法律的條約，而集合歐洲的東方集團於一體。加強華沙公約組織與經濟互助會議的活動。此外，東方集團中的原子能、鐵路與船舶等方面，亦建立在一個多邊的基礎之上。

蘇聯的領袖們，對政府擴張東方公約組織及建立起「國際分工」以加強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上對蘇俄的依賴等措施，並不感到滿足。又採取了於共黨中加強政治觀念相結合的步驟，無論是在東方集團之內或東方集團之外，用以束縛他們，使其與蘇俄的共黨更為接近。另外一個目的，即在東方集團中的共黨間以及國與國間所組成的機構之間，例如華沙公約組織與經濟互助會議，建立起直接密切的關係。黨與黨間的聯繫活動，包括雙方與多方面。可採用下面的方式，其一，在雙方商談時，參加會議的黨的代表，可獨自或與政府代表一同參加雙邊會談。另外一種方式是，召開國際共黨會議，既包括整個世界共黨運動，亦包含僅限於東方集團，或其歐洲範圍內的共黨會議。

一九五七及一九六〇年的共黨高階層會議，被安排得像天主教教皇的秘

密會議一般。黑魯騰夫企圖在東方集團與世界共產運動中，恢復蘇俄的霸權。雖然他盡了全力，但莫斯科與北平間的衝突，使他的努力終告失敗。與中共的合作，暫時恢復了一種表面上的團結。但很快的就證明了這一套都是虛偽的，因其重新聲明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不會因史達林主義者的頑固理論而加強推行。「社會主義集團」的團結受到了威脅，一方面由於分子間發展的程度不同，而且亦由於有某種共同觀念的傾向，即在全世界的共產運動中，明顯的被分成了「修正主義」與民族主義。這些，在蘇俄與狄托主義的南斯拉夫以及毛澤東主義的中共的衝突中，已表現得十分明顯了。由於這種情況的發展，出現了兩個領導的中心，變化多端地領導着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黑魯騰夫曾在兩次莫斯科高階層會議中，欲尋求恢復獨斷統一的世界共產主義，就像以前世界共黨中央集權的組織一樣，但對現在多數共產主義勢力的抬頭，證明已到了不可能挽救的地步了。

二 蘇俄霸權勢力的兩線鬥爭

在史達林之下，蘇俄的霸權已發展至一個全面統治的體系。將歐洲中東部的人民民主，合併入蘇聯，亦即重演一次一九四〇年霸佔波羅的海諸國的事件，全部作法，都是爲了要使在歐洲東方集團中的霸權聯盟，變成一個羽毛豐滿的帝國。史達林爲了國內及國外政策上的理由，壓制住了這個計劃中最後的一步。

在蘇俄國內政策的範疇中，對歐洲衛星國家的同化，將給蘇俄帶來一種組織上的劇烈變更，因爲這些國家，毫無問題的，沒有一個——除去波蘭的一部份而外——會隸屬於蘇俄帝國。他們與蘇俄的文化淵源甚深，但泛斯拉夫(Pan-Slav)的傾向却發展得十分緩慢。他們在由多數國家所組成的蘇維埃國家之中，將會加強各國的獨立主義與分離主義的力量，很明顯地，將削弱大俄羅斯民族在蘇維埃統治權內所居國家主權棟樑的地位。蘇聯共產黨的國家及社會的構造，均將作一種基本上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所產生的反應，是不能預料的。至於對外政策，如不解決對德問題，而言對衛星國家的合併，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狄托的叛變，其主要因素，乃在阻止史達林的割據盧比孔(Rubicon)。

世界共產主義：沒落抑分化？

狄托歷史性的成就，乃在他增強了歐洲中東部的人民，去保全他們自身的願望，因此，使史達林併吞他們的計劃，遭遇到了失敗。這位南斯拉夫的獨裁者，更進一步的對世界共產主義中早已潛伏着的趨勢，提供了第一個具體的表現，即「修正派社會主義」。陶格里亞蒂的「多核心主義」論文及他的「證驗」中，就其更爲自由的基本態度看來，對吉拉斯(Djilas)更爲接近，勝過對狄托或卡地爾吉(Kardelj)，因此，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可能不與蘇俄統治下的共產主義情報局破裂。

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時常被西方的觀察家們認爲是「國家的共產主義」。自從史達林及毛澤東出現以後，國家共產主義亦存在於蘇俄及中共，但是，是以一種極權主義的形式，及注入了世界使命的思想。「修正主義」是國家共產主義中的一種較自由的形式，以國內及國外政策的目標來作爲正確指示的標準，而成爲一個「改良的共產主義」。進化勝過革命，是改良共產主義的基本要旨。

改良的共產主義，捨棄了黨是沒有錯誤的獨斷理論。因此，對黨「在表面上」掌握了全部控制的權力，及滲入了全部社會生活的範圍，發生了疑問。它準備以相當和緩的一黨獨裁統治去調和社會以及公民個人在更爲廣闊的領域中的自治行動。這種對黨獨裁政治的自制，以及更爲寬大的態度，暗示出對自由已作了相當程度的放寬，因此，可以說這是自極權主義所作的一個轉變。由於採納了某種經濟政策，使這種轉變更推進了一步，即將市場經濟與計劃要素相結合，認爲對社會真正的需求作最基本的注意，遠勝過烏托邦對未來的幻想。雖然改良的共產主義並不攻擊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哲學與理論的精華，但仍然對社會上各階層有滲透的力量，不但促進了社會的自發，亦促進了個人的自動。

在外交政策方面，改良的共產主義採取「和平共存」的概念，這種概念，與國際法完全相符合，與資本主義世界中現實的看法亦相一致。但這與蘇維埃的觀點相矛盾，蘇維埃主張與其相對立的集團及附屬國之間的關係，應限制使用「共存」的政策。在政治史中，共存只限於有限的時間，雖然這段時期可能持續相當長久。但它並不擴展到知識或觀念學的概念與信仰的範疇之內。在蘇俄的想像中，「社會主義世界」之內，「和平共存」的原則，是附屬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這是莫斯科霸權的另外一種表現。改良的共產主

義，要求無限制的應用「和平共存」，無論是在共產主義統治的區域之內或任何其他地方。共存原則，主張應與民族自決的原則相調和，以及在「至社會主義不同的道路」的體制內，滿足權利平等的要求。這種明顯的對將領導權操縱在一個統治中心，無論是莫斯科或北平，乃係基於改良共產主義顯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論，該理論不但反對Zhdanov兩個陣營的理論，亦不贊成「包圍資本主義」的思想，後者，在黑魯曉夫將下台不久之前，亦被捨棄不用。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的演說中，顯示出中共亦曾一度發生過傾向於改良共產主義的趨勢。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另有目的的。蘇俄雖會對毛澤東致力於製造一些矛盾的理論，採取一種保守的態度，但却不得注意這種左翼「托洛斯基主義」偏差趨勢的突然轉變。

在與毛澤東發生爭執的過程中，在初期，黑魯曉夫與狄托表現得十分接近。但他並沒有將改革政策向某些剛開始轉向改良共產主義的國家推行。雖然他在一九六三年八月訪問布爾格來德時會對南斯拉夫勞工們的自行管理制度給予特殊的讚揚，但他從未將蘇俄的工廠組織改變成與南斯拉夫的制度一樣。准許狄托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最高蘇維埃發表演說，以及南斯拉夫在十四國「社會主義國家」的組織中享有一席之地，但中共却排斥在外的事實，並未顯示出與狄托主義理論上的爭執已獲得解決。完全相反地，蘇聯共產黨所公佈的一九六一年新計劃，對該計劃，黑魯曉夫曾作了一次詳盡的解釋，而且他的繼承者亦採納了，指出了改良共產主義，尤其他對南斯拉夫的看法，認為是「重要的理論上的危機」。

改良的共產主義，其中，狄托主義是唯一的例子，在與蘇俄對正統共產主義看法的矛盾中，佔有兩點優勢。首先，對滿足那些在歐洲中東部與蘇俄境內，被「反史達林化」解放了的社會力量對未來所抱的期望，開闢了一個遠景。它可以解決那些只憑組織的方式尚不能控制的問題。第二、莫斯科需要利用改良共產主義的思想，以對抗來自北平的理論上的攻擊。因此，改良的共產主義，不僅在共產主義世界中，所產生的哲學與理論上的爭論情勢中獲得益處，而且亦加深了西方智識階級對它的注意。

同時，西方與東方對「正統」共產主義原則所發生的理論上的衝突，亦更形加深了。中共，被蘇俄指控為「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却以他們

與「古典派」的馬克斯主義，無論在文字上及精神上均相協調一致的事實來作為論爭力量的後盾，與蘇俄相反地，中共仍認為史達林是一個「古典派」。因此，他們在世界共產運動中，可能是死硬派的革命論者，以及史達林主義派的「保守份子」。

這種爭執，直至目前，包含着知識上與理論上的因素，但亦有政治權力的因素在內，顯示出了，蘇聯共黨要以均等的力量在同時去應付兩個問題，是十分困難的。對蘇俄的攻擊，因外國「獨斷的」力量漸漸加深，必會導致蘇俄境內反對「修正主義」的自衛戰爭。這種兩線鬥爭，需要一種理論上的適應，而蘇俄共黨的理論家們，大多數均係自史達林時代即已存在，因此，發現要達到這個目的是很困難的。它腐蝕了蘇聯共黨的本質以及驅使黨的領導人物在外交政策方面去尋求救濟之道。

本刊五卷五期目錄

現代經濟發展之趨向……………孫科

非洲問題（座談會記錄）……………徐家驥 李其泰 雷松生 張棟材 孫德湘 張兆 丁匡華 斯中西 趙廷俊

最近兩年共匪對外貿易分析……………張維亞

透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尹慶耀

蘇俄科學院論美蘇關係……………呂素質

蘇俄與北越最近關係之分析……………關素質

對俄共當前戰略、策略之觀察與展望……………鄒宇光

自由民主思想在蘇俄的掙扎……………王啟升

共匪挽救「人民公社」危機的觀察……………潘廉方
共匪半農（工）半讀制度的推廣……………汪學文
蘇俄動態述評……………一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編者
編後記……………編者